

· 党史资料 ·

一九三八年日军战略调整与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

张 展

1938 年，日军进行战略调整，随后根据战局的变化发动徐州会战并攻向武汉，“给八路军在华北繁殖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时机”^①。毛泽东指出，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②。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围绕日军这一决策的脉络及其后果，考察抗战军事形势动态演变的研究仍有空间^③。本文以论述日军战略流变为基础，结合国共双方对敌情的判断与应对，以华北为主探讨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展现中共崛起为抗战军事格局重要一极的过程，对敌后战场如何逐步发展为抗日主战场这一重大问题的解释有所补充。

一、日军回师占领区的规划与中共的预判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中国抗战局势严峻。国民党的被动防御宣告失败，包括首都南京在内，华北与长江下游各要地先后沦陷，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刚刚开始，八路军主力集中于山西一省。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④。而日军在连续进攻后，需要休整部队，稳固后方，攻势有所放缓。

为应对中国持久抗战，日军计划在正面进攻告一段落后，限制进攻范围来节减消耗。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迁都至大后方的重庆，宣布长期抗战。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国民党持久战略意在“诱引帝国军队深入内地”，“通过拉长战线虚耗帝国的国力、军力”。他们将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称为“借地域而行持久”，主张日军“亦应从速完成持久态势，力避国力散逸”，为控制战争消耗，“应果断放弃积极行使武力之方针”，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收缩。日军要“避免拉长战线，停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日本侵华作战相关文献的收集、翻译与研究”（20KZD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46 页。

② 《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5、506 页。

③ 杨奎松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与《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6 期）、黄道炫的《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2 期）、于化民的《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在对中共战略大开大合论述的同时，兼顾对应的日军动向；杨奎松的《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量——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 年第 1 期）、黄道炫的《抗战初期在山西的八路军——以阎锡山档案为中心的探讨》（《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 年第 2 期）、赵诺的《抗战初期中共组织在太行山区的“战略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16 年第 2 期）和苏圣雄的《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台湾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等专题研究，则论及 1938 年华北战争格局的形成。而对日军相关战略的考察，国内学者多在梳理抗战战略时有简要映照，如郭汝瑰、黄玉章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岳思平的《八路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1 年）等。因此，对在特定时期与特定地域军事战略的专题研究尚有发展空间。

④ 参见《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1937 年 11 月 13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116 页。

止开辟新战线，主要利用航空力量进攻内地，集中力量确保占领地的治安”。^①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宣布停止媾和谈判，从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②。参谋本部认为，至此“事变已成为长期战争，必须为持续四五年之久做好准备”^③，规划日军“消极持久战”“正面进攻战”“长期普遍持久战”三个作战阶段。“消极持久战”为战略收缩与休整时期，预计持续一年半左右。在此期间，日军将占领区限制于黄河以北及山东、芜湖至杭州以东地区，还有广州一带，“彻底转向战略紧缩态势，严格控制已有占领区，严禁扩张新占领区”。进攻武汉被置于第二阶段，即1939年下半年之后。^④2月16日，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将作战重点转向占领区的方针^⑤。

华北是日军占领区的核心，也是其准备集中力量肃清的重点地区。参谋本部要求“以华北为中心成立中央政府”为前提“彻底稳定华北”，尽快控制黄河以北地区^⑥。至1937年末，日军已沿交通线占领山西、河北主要城市与大片地区。日军攻占太原后，天皇于11月13日对华北方面军下发敕语予以嘉奖，标志着其已完成阶段性目标。15日，华北方面军发布甲第126号作战命令，以“确保现有占领区的安定，同时整顿军队、恢复战力，准备南方的下一阶段作战”为方针，命令第1军“确保太原盆地及作战地区内，尤其是主要交通线附近的安定”，第2军“击溃黄河以北之敌，确保津浦沿线的安定”^⑦。由此，除第2军继续沿津浦线向山东正面进攻外，华北方面军主要转入稳定占领区的作战。日军采取循序渐进的作战方针，“先确保军队驻扎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治安，之后逐渐扩大至整个地区”，并以中共作为占领区的主要对手，“将讨伐重点指向中共军队，尤其要尽早粉碎共产区域的形成”^⑧。华北方面军认为，“山西可以左右整个华北的治安，但情况最为恶劣”，在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山西后，中共的主导地位得以建立，成为“治安的祸根”，需要尽快将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中国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南”。^⑨华北日军随之开始各种大大小小的“扫荡”。

对于华北的形势，中共认为，太原失陷是华北战争格局变化的关键节点，“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日寇不久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⑩。而中共应对日军进攻的作战方针，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为战略方针。刘少奇于9月至11月不仅提出在山地而且在平原能够也必须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还要求在华北广大的乡村组织与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提出批评，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坚持认为游击战的方针是对的，不应改变。^⑪

① 一復資料課『昭和12年末对支情勢判断』、1946年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146400。

② 『帝国政府声明』、1938年1月16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0534700。

③ 堀場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原書房、1973年、143頁。

④ 参謀本部第二課『昭和13年以降ノタメ戦争指導計画大綱案』、1938年1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056000。

⑤ 『中国での作戦活動の可否をめぐる大本营御前会議の討議状況について』（1938年2月16日、『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第1冊、六一書房、2011年、264頁。

⑥ 参謀本部第七課『支那ガ長期抵抗ニ入ル場合ニ対スル情勢判断』、1937年11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0551400。

⑦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戦経過の概要』（3）、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100。

⑧ 北支方面軍司令部『軍占拠地域治安維持実施要領』、1937年12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327300。

⑨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ノ治安維持ニ関スル着眼事項』、1937年末、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30200。

⑩ 《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8日）、《关于在敌向山西内地进攻形势下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2—375页。

⑪ 沙友林《刘少奇对完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中共要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从军事角度来看是风险较大的战略选择。相较于与国民党主力部队相互配合的运动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意味着实力尚弱的八路军要深入敌后，远离有力友军与后方支持，以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周旋。毛泽东指出，这需要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①。中共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前提是，“旧的政治机构已被日寇破坏，而日寇与汉奸的政权还没有在广大的乡村与无数小的城市建立起来”。但是，日军击溃国民党军后，势必要肃清后方以巩固阶段性侵略成果，不太可能不顾后方持续冒进。所以，中共认为，“如果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不能继续坚持与扩大，我们就要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独立地和日寇作战”。^②

山西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击溃后，中共抓住机会推进战略展开，并以避免单独与日军正面对决为原则。八路军最初发展的空间非常狭小。朱德、周恩来提出，以察绥晋三省交界的三角区为八路军活动区域，毛泽东则提出应选择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四角地区，即“小四角”，位于太行山脉北部，恒山、五台山一带^③。日军攻向山西后，狭小的战略空间当即造成八路军的被动态势。中共中央判断，随着太原沦陷，恒山的八路军“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为打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命令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以自觉的被动态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第129师开往恒山山脉南端，逐渐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④，“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则难以立足”^⑤，要将八路军“小四角”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的“大四角”范围中，而重点于五台山脉。但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使八路军发展立足的时间极为紧张。太原沦陷时，八路军立足尚不稳固，吕梁山脉等部分预定的主要根据地的工作尚未开始，中共中央要求不应“恋战”，要“迅速转移”，以不打硬仗为原则^⑥。此时华北虽然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但八路军仍将生存立足作为首要考量，主力也局限于山西一省，尚不具备塑造抗战整体格局的能力。

向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同时为八路军带来机遇与挑战。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与八路军领导人，报告“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便全力对付八路军”^⑦。在日军回师进攻八路军时，要不要将八路军主力撤出山西，引发党内的讨论。鉴于尚难与日军正面对抗的现实，中共中央要求“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⑧，但后撤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策，八路军主力“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⑨。后撤的预期在党内催生了部分悲观动摇情绪，出现了“目前即以红军退过黄河为布置工作的出发点”的倾向。但如果真的退过黄河，“将使我党与红军在各方面感受极大困难，影响华北人民对游击战争的信心，这是最坏的前途”^⑩。周恩来也强调不能轻易后撤，八路军留在华北抗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⑪。23日，毛泽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4、425页。

②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1月15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③ 于化民 《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④ 《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7页。

⑤ 傅钟 《敌后抗战的开端》，《八路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69、78页。

⑥ 《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72、373页。

⑦ 于化民 《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⑧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⑨ 《巩固河防为目前紧迫任务》（1937年11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21页。

⑩ 《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我军军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72、373页。

⑪ 《刘少奇、杨尚昆关于扩大红军、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问题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⑫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00页。

东与张闻天强调“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①。

中共对华北抗战前景的审慎预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此时的日军确实准备切断渡河退路，将中国军队围歼于华北。他们着眼于肃清黄河以北地区，发动“河北戡定战”。1938年1月14日，华北方面军命令第1军以约3个师团的主力，“从京汉线方向推进至新乡附近，将敌压缩至黄河以南，之后以一部沿黄河西进，切断山西南部敌人退路，以约两个师团策应，沿同蒲线向黄河一线推进，另向离石方向发起作战”^②。正如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所言，这一作战思路是“压制黄河各渡河点以完成包围，大量敌军便成了囊中之鼠，我军通过料理此囊中之鼠，完成对占领地区的控制”^③。2月，日军开始进攻晋南，并围攻晋西北根据地以策应。17日，新乡沦陷。20日，潞城沦陷。27日，日军第108师团占领临汾，第109师团占领黄河东岸的碛口和军渡。^④

日军的进攻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随着山西战局恶化，日军在军渡、碛口猛攻河防，威胁绥德、延安以及河东部队的归路。毛泽东3月2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三个师的负责人，要求巩固河防并阻滞日军对潼关的进攻^⑤。八路军总部“同意中央关于保持渡口，巩固后方联络线，在适当时机转移兵力，同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请中央及军委名义对战争形势、前途给八路军及华北党以原则指示”。3日、9日，中共中央两次指示八路军，将主力留山西断敌后路必须是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并要求朱德与彭德怀回陕，防止被日军隔断于山西^⑥，担心“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⑦。

但是，日军暂时未有继续扩大进攻的计划。3月6日至8日，日军第20师团先后攻占蒲城、禹门渡、潼关渡、芮城、平陆，“控制了山西南部各渡口，完全切断了敌军退路”，基本完成战役目标^⑧，并未继续深入陕西、河南。10日，参谋本部规定华北方面军作战范围为“胶济沿线及自济南起黄河上游左岸”，即济南之上的黄河，河南、山东段以北，山西段以东地区^⑨。以黄河为作战限界，华北方面军准备“以第20师团占领黄河各渡河点，并炮击对岸的潼关，这不仅不仅可以阻止陇海线的运行，还能给敌军精神上带来巨大动摇”^⑩。而第20师团所属第1军认为，以有限的兵力无法完全封锁黄河渡口，“如果不让一个敌人到黄河以北，不仅任务过重，而且也没有必要，考虑到黄河之长与兵力之短，在河岸附近配备警戒部队，在敌军渡河时反击消灭即可”^⑪。

日军基本达成包围华北占领区的战略态势后，准备继续强化肃清占领区。3月10日，华北方面军宣称，“黄河以北敌军主力基本溃灭，华北戡定略成”，命令“第1、第2军在各自占领区剿灭残敌，尽快在地方充实自卫排共组织，确立肃清治安的基础”，完成时间“以本年6月末为目标”，并

①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②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戰經過の概要』（5）、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300。

③ 第1軍參謀部『第1軍機密作戰日誌』、1938年3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7500。

④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戰經過の概要』（7）、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500。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⑥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5、196页。

⑦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5页。

⑧ 第1軍參謀部『第1軍作戰經過概要・河北戡定戦』、1938年3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83100。

⑨ 大本營陸軍部『大陸命第75号』、1938年3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60904000。

⑩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戰經過の概要』（7）、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500。

⑪ 第1軍參謀部『第1軍機密作戰日誌』、1938年2月16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6200。

计划4月底集中重兵统一在山西北部围歼八路军^①。第1军据此发布作战命令，称“各兵团之勇战已重创敌军，其大部逃过黄河，但山西省内太原、潞安两盆地中间山地（太岳山）、潞安盆地北部山地（太行山）及山西与陕西省境附近，尚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军队与败军企图搅乱我后方，我军准备着力于控制既有占领地区”^②，并准备派遣第108、第16、第109、第20师团，对蒲县及隰县附近的国民党军、潞安北部和以五台为中心的八路军展开大规模“扫荡”^③。

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对占领区的作战设想是加强封锁，回师肃清，组建占领地守备部队，利用伪政权组织伪警察和伪军，并大力建设碉堡与要塞设施^④。日军回师“扫荡”将给抗日根据地带来沉重压力，中共中央从严料敌，但暂不准备命八路军主力撤出华北。在日军进攻于3月中旬暂告一段落时，毛泽东对日军的作战意图作出准确判断，指出：未来日军“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⑤，“大举摧毁我经济基础”，“占领黄河两岸各主要渡口”，这些情况“是必然会到来的，有些已在实施”，因此“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否则将陷于极大困难”^⑥。但中共中央同时认为，主力不应轻易过河，即便黄河渡口被日军控制，只要敌攻武汉便将造成东部后方空虚，八路军有“走河北过山东入安徽”的迂回路线可走，“如有某一条活路，则即被隔断，亦不怕他”^⑦。

根据日军的战略计划，八路军的退路确有被隔断的危险。华北方面军部署第20师团守备山西南部，第14师团守备新乡周边，第16师团守备高邑、彰德、濮阳、临清之间，第109师团守备太原周边及离石附近，第108师团守备潞安及阳泉、昔阳附近，上述各部同时负责警戒当地黄河沿岸^⑧。中共判断日军将很快进攻武汉，但日军计划进攻武汉尚在一年半之后，此时的作战方针是肃清占领区。在华北，日军第1军逐步控制封锁黄河渡口，同时肃清占领区，第2军亦将在完成津浦线的作战后回师控制河北、山东。中共并未放松对形势恶化的警惕。3月2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提出“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应组织若干支队作为游击兵团^⑨。

1937年底至1938年初抗战格局的主轴，仍然是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战略防守，中共军队在华北的发展尚属初始阶段。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太原失守前是第一阶段，八路军主要配合友军作战。太原失守后是第二阶段，八路军各师主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向山西四角进行战略展开。此时八路军主力仅数万之众，根据地亦局限于五台等少数地区，实行战略展开以打开空间局限是八路军迫切要完成的任务。但如果日军赶在八路军完成战略展开前即按计划停止冒进，先回师肃清华北，将八路军困于少数根据地内全力围攻，将严重威胁八路军的生存发展。为此，中共也审慎考虑在不得已之际将八路军主力撤出华北的预案。但日军作战计划突然变更，八路军抓住机会实行战略展开的第三阶段，在1938年4月后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⑩，确保游击战争机

①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戦経過の概要』（7）、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500。

② 第1軍参謀部『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1938年3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7500。

③ 第1軍参謀部『第1軍作戦経過概要・河北戡定戦』（1938年3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83100。

④ 参謀本部第二課『昭和13年以降ノタメ戦争指導計画大綱案』（1938年1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056000。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4页。

⑥ 《与国民党谈华北军事时注意分两个阶段》（1938年3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7页。

⑦ 《刘伯承师目前留东边活动有利》（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99页。

⑧ 第1軍参謀部『第1軍作戦経過概要・占领地肃清戦』（1938年5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83200。

⑨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208页。

⑩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95页。

动转移所需的回旋余地。而日军战略的变化，与其内部博弈及抗战正面战场格局的变化有关。

二、日军的内部博弈与其侵华战略的调整

1938年初的战争格局，对日、国、共三方而言均难称有利。开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尚未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缺乏游击战需要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军队丢失华北与长江下游大片土地后，仍处于被动挨打的防御态势。日军虽然成功实现了一系列作战目标，掌握战场主动权，但未能实现速决决胜的战争目标，战线的拉长大幅增加其战争消耗。

参谋本部战略收缩的作战方针，在日军内部引发了争议。日军采取军政、军令分离制度，陆军作战事务由参谋本部奉天皇之命代行“统帅大权”。1938年初，时任参谋总长为皇族载仁亲王，实际负责日常事务的是参谋次长多田骏，具体制定日军作战计划的则是作战部作战课。作战课战争指导班班长高嶋辰彦曾在多田骏支持下上书近卫内阁，提出日本对苏备战不足，需要促成日中和谈，或在华进行彻底的战略收缩^①。中日媾和失败后，参谋本部判断侵华战争将长期化，日本需要限制在华战争消耗以防备苏联，故以对华作战期间苏联参战为前提制定1938年的陆军作战计划^②。但陆军省对参谋本部的作战方针存在反对意见，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称，参谋本部的方案过度强调对苏战备，对中国战场的投入明显不足。陆军省军事课一致反对参谋本部的收缩方针，课长田中新一分析，参谋本部的思路是“如今无法以作战解决事变，好比是无法对敌心脏一击致命，作战不过是使其局部、未稍出血而已”，主张仍要以速决方针应对侵华战争，“通过推进作战寻求解决事变的机会”^③。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也表示，参谋本部不愿扩大投入，是“对以长期战争收拾时局缺乏热情”^④。

身处前线的华北方面军从具体作战角度提出折中方案，即先攻占徐州，再转入战略收缩。他们强调要维持战线，必须先攻下徐州以站稳脚跟^⑤。第1军主张，在转攻为守之前，先占领郑州并决溃黄河堤防，以洪水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将之在徐州围歼；再打通津浦线，“华北与华中的联结将极为紧密，应对蒋介石所企图的长期抗战即可万无一失”^⑥。第2军也提出，顺应长期战争的“对华新国策”，必须拿下陇海线，尤其是陇海、津浦两线交汇的徐州，从而便于迅速转移兵力，以免兵力分散，而且徐州附近还是盐米之乡，财源充足，利于持久消耗战。他们也主张掘开黄河堤防，提供一道隔绝日中两军的天险，方便在未来长期对峙时节约兵力，决堤地点选择在郑州以东的兰封（今兰考县）^⑦。对于这些请求，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避免扩大战线为由坚决回绝，表示“华北方面军应恪守中央的方针”^⑧。

日军战略方针转向保守，而国民党却转向进取。一直到南京沦陷，国民党“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⑨。国民党试图寻机转向攻势防御，改变消极待敌来攻的被动局面。1938年1月中旬，日军第2军完成“向曲阜—蒙阴一线的追击”“攻击济宁”

① 参谋本部第二课『情勢判断（高嶋大佐私案）』、1937年11月2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40900。

② 参谋本部『帝国陸軍作戰計画（案）』、1938年3月3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121199100。

③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7年、第536—538頁。

④ 参谋本部第二课『機密作戰日誌』、1938年2月4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391700。

⑤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2軍の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⑥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第85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⑦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2軍の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⑧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方面軍作戰機密』、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400。

⑨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544页。

“沿胶济线向青岛前进”的作战任务后^①，基本停止了沿津浦线的攻势。第一战区向蒋介石汇报，日军在津浦线因兵力不足，损失过重，“未敢南犯”^②。蒋介石要求第一、第五战区“应保持主动地位，对威胁我军之敌采取攻势，使敌人陷于被动。如此我军才能固守，才能借津浦、道清两铁路来屏障武汉”。2月4日，军委会命令第五战区“迅向津浦路北段济宁以北采取攻势”^③。

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反击，侵华日军则借机寻求参谋本部授权其南下。2月3日，华北方面军向参谋本部提出，徐州以北集结了10多万中国军队，“我军应以自卫立场寻机击敌”。河边态度强硬地回复，如果“受敌军引诱而意外地扩大战线，分散兵力”，会破坏下一步军事大局，强调“在现占领地区以南，就算以自卫为名采取攻势”，也是“中央部已确定的大方针所绝不允许的”^④。但华北方面军不以为然，参谋长冈田直三郎认为“限制对华作战范围，给了蒋政权缓过气的余地”。为弹压反对意见，河边赴华视察，当面向冈田强调“作战方针经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即便存在担心拖长收拾时局时间这样的反对理由，中央部也不以为意”^⑤。

1938年2月的津浦线战局，呈现国民党军攻、日军守的态势，影响了国民党高层对战争形势的判断。2月6日，第五战区令第三集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之敌，以其一部攻击汶上之敌^⑥。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后，华北方面军向参谋本部提出派遣第10师团驱逐反攻济宁、汶上的中国军队，并以第5师团一部策应攻向临沂，承诺这是“追击眼前之敌，绝不是深入的南进作战”，但未能得到参谋本部批准^⑦。日军限于战略收缩方针，对中国军队的进攻采取防御姿态。蒋介石认为日军“津浦战事已受顿挫”，“必待援再攻”，而援军兵力也捉襟见肘，“当不足为虑”^⑧，到2月“敌军行动迟缓，较预想相差甚远”^⑨，至3月“倭军现势仍是消极”，怀疑“倭寇制造南京伪组织，将为终止军事行动之预备乎”^⑩。军委会也分析认为，“敌人为了缩小战场及节省兵力起见”，将“使江南江北之一部部队，暂取守势，抽调兵力，移师北上，以扫荡我国在河北及山西作战之部队”^⑪。

日军参谋本部坚持战略收缩的强硬态度，遭到陆军省的暗中反弹。3月1日，仍在华视察的河边突然被外调到滨松飞行学校，由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接任作战课课长。河边认为这次人事变动的背后是路线之争，自己对战略紧缩方针立场坚决，导致有人背后活动罢免了自己^⑫。作战课课长调整后，参谋本部批准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请求。3月上旬，对参谋本部“有无扩张战线之意”的质询，华北方面军强调“中央部误解了我们”，得到参谋本部许可追击^⑬。日军第10师团与第5师团一部随之南下，追歼在济宁、汶上攻坚不利的国民党军队。

日军既然兵力不足，为何仍分兵南下？国民党认为，其意在借战胜之威，侥幸投机于轻兵袭取徐州，故应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打击。“敌人因军事著著顺利，因而骄狂至极，徐州为战略要点，敌

①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月1日以降作戰經過の概要』（5）、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300。

② 《程潜电蒋中正称转据宋哲元电》（1938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200-00019-085。

③ 蒋纬国等编《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第106页。

④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方面軍作戰機密』、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400。

⑤ 『岡部直三郎大将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第161、165、166頁。

⑥ 蒋纬国等编《国民革命军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第107页。

⑦ 『戦史叢書・大本营陸軍部』（1）、第536、537頁。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2月19日、2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⑨ 叶健青《事略稿本》（41），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50页。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20日、2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⑪ 军委会办公厅《抄目前抗战上亟应注意之事项》（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305页。

⑫ 『河边虎四郎回想録』、毎日新聞社、1979年、92頁。

⑬ 『戦史叢書・大本营陸軍部』（1）、第536、537頁 『岡部直三郎大将日記』、171頁。

我必争之地，而敌人仅以矶谷廉介之第10师团由津浦北段南下”，配合第5师团及华中派遣军少量兵力企图攻取。对此，军委会“令第五战区采取攻势防御”，“令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廖磊、李品仙、庞炳勋等有战斗力量之部队赶迎徐州准备会战”。^①3月17日、18日，张自忠、庞炳勋部在临沂重创日军第5师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捷称，日军“被我军围攻，歼灭甚重”^②。蒋介石通报其他战区，日军在临沂被“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猛烈追击”，“津浦线北段正面之敌”也遭“多方面包围聚歼中”，此战“为开战以来不可多得之胜利”^③。第5师团在临沂受阻的同时，负责将中国军队赶向大运河以西的第10师团，其濛谷支队也在大运河畔的台儿庄遇挫。

日军孤军深入受挫，坚定了国民党对攻势防御的信心。国民党高层普遍认为日军疲弱，应借机扩大战果。徐永昌称“与其战于武汉，何如战于晋、冀、豫、鲁？”临沂报捷后，程潜、宋哲元、商震、白崇禧、刘峙等“咸主积极进攻”，只有蒋介石介意日军防守能力，要求待敌来攻^④。但蒋介石也未能判断日军分兵南进的真正意图，一方面，“观乎鲁南倭寇之战况，实呈强弩之末之象，断定倭寇不敢再进矣”；另一方面，发现日军又无撤退之意，“临沂之敌，进退无常，台儿庄之敌，败而不退，其后方亦无援军，究有何待，应切实研究”。但最终根据对战争局势的整体判断，蒋介石认为打通津浦线意味着日军要放弃战略收缩，下定“进攻粤汉之决心”，而“倭寇上月末不能打通津浦线，或将变计，军事至今险恶时期已过其半乎”^⑤，可以大胆“再加预备军竭力歼灭台儿庄之敌”^⑥，其思路立足于判断日军“不能”的基础之上。

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日军仍然掌握战场主动权，“依此时敌情，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⑦。蒋介石的战略思路有着明显的冒险色彩，原本主张进攻的徐永昌转而劝其谨慎，“敌不难立调数万精锐与我一拼”，不可对日军“过事强迫”，“何必冒大危险以求一日之逞”。蒋介石对此也表示了认可^⑧，但仍继续向徐州增兵。此举为国民党军带来局部战场的短期优势，“进攻台儿庄之敌，只剩矶谷廉介一师团”，“以一师团对我十师”，结果日军损失惨重。白崇禧宣称，这是敌军“轻敌之结果”，增兵“是最高统帅明智之决策，为台儿庄胜利之基础”^⑨。

根据战局的变化，日军参谋本部放弃了战略收缩方针。3月，除华北方面军外，华中派遣军也上书参谋本部，并同时由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上书海军军令部，请求攻占徐州、安庆^⑩。这意味着在日军内部，陆军省、侵华陆海军部队乃至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均坚决主张继续进攻。3月24日，华北方面军向参谋本部报告，“与优势敌军近距离接触”，中国军队发起了“决战攻击”，用重兵“对我军各个击破”，日军若借此机会进军徐州，可以获取“伟大之成果”。多田骏最终让步，于4月3日通知华北方面军“内定击破徐州附近之敌”。^⑪7日，参谋本部正式发布进攻徐州的命令^⑫。日军之所以改变作战方针，也因为军政高层此时准备重新劝降国民党政府，旨在应对持久战的收缩战略失去存在理由，而战场形势等客观原因使日军的战略转变极为仓促。

①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98、100页。

② 《李宗仁报捷》（1938年3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1-072470-00011-001。

③ 《蒋中正电阎锡山》（1938年3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116-010101-0122-171。

④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91年印行，第241、249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28日、31日、4月1日、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⑥ 《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255页。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67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256页。

⑨ 《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册，第99、100页。

⑩ 『畑俊六日誌』、みすず書房、1983年、126頁。

⑪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第2軍の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⑫ 大本營陸軍部『大陸命第84號』、1938年4月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4060904000。

首先，中国军队的反攻使日军需要转入大规模的攻势，才能保持有利的战略态势。日军注意到，中国军队“认为我军专心于稳定占领区，已无攻势作战余力”，因此“行动越来越活跃”，“如果放任不管，不要说扶植新政权解决事变，就连在华日军的安全都不能保证”，所以“大本营决定对集中于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以一大打击，消除我军烦扰，挫败敌军的抗战意志”^①。其次，日军急切需要挽回台儿庄败局。“台儿庄的失败，使得有必要给予徐州之敌以决定性的打击。”^②再次，台儿庄之战产生了不利于日本的国际舆论。美国媒体称台儿庄之战是“日军前所未有的屈辱战败”^③；中国驻美陆军武官郭德权报告“美将校自称过去被日本夸张所误，刻日军纸虎已被华军刺穿，竟遭惨败，遗弃伤亡于战场，实日军奇耻。”^④日军担忧中国围绕台儿庄之战的积极宣传，“使援蒋各国更加积极”^⑤。最后，日军希望抓住时机消灭国民党军队在徐州的主力。华北方面军主张“徐州的得失相对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对聚集徐州的敌军集团以尽可能大的打击”^⑥。这些因素使日军急于迅速打开战局，以免贻误战机。

日军进攻徐州的主要目标，由攻占要地转向消灭有生力量，这要求投入远较预期更多的兵力。日军参谋本部得知“徐州附近聚集着四十个师约四十万军队”，判断“这是捕捉歼灭敌军的好机会”，要求在徐州附近发起围歼战^⑦。华北方面军准备构建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以东吸引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和西南包围之，切断其退路，进而攻占徐州，歼灭敌军”^⑧，同时针对来自陇海线的增援兵力“围点打援”，在徐州附近“各个击破”^⑨。围歼战不仅要求投入大规模兵力，还要求迅速行动以免对手逃脱，结果如畑俊六所观察的，参谋本部对进攻徐州要求很急，“规模也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大”^⑩。

日军仓促发动徐州会战，已无时间从国内调兵，只能直接从山西等占领区调集部队。华北方面军共辖8个师团及若干独立部队，包括第1军下辖第14、第20、第108、第109师团，第2军下辖第5、第10师团，方面军直辖第16、第114师团，此外还有中国驻屯兵团，独立混成第3、第4、第5旅团等^⑪。其中直接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仅以师团为单位，便包括了第5、第10、第14、第16、第114五个师团，可以说是抽调了华北占领区的大半兵力。

日军兵力部署的大调整，对山西驻军的影响是重大而普遍的。日军虽然确定了“扫荡”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但未能真正得以全力实施。2月，日军忙于进军黄河的正面作战，对八路军的“扫荡”兵力有限。如华北方面军派直属部队进攻灵丘附近八路军时，希望第1军派兵进攻涞源的八路军来策应，但第1军表示，现在正向南方作战，后方没有能调用的兵力了^⑫。3月，日军计划先由部分师团单独对八路军进行“扫荡”，待各部队准备完成后，再集中主力进攻各根据地，尤其是围

① 一復資料課『支那事变に対する帝国参謀本部の作戦計画・事变第2年度（昭和13年）』、『昭和13年春季对支情勢判断』、1946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094600、C12120155400。

② 堀場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162、163頁。

③ 内閣情報部『情報四一三第一号』、国立公文書館蔵。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M0000000000000764646。

④ 《驻美陆军武官郭德权电蒋中正》（1938年4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300-00010-022。

⑤ 一復資料課『支那事变に対する帝国参謀本部の作戦計画・事变第2年度（昭和13年）』、1946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094600。

⑥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2軍の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⑦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芙蓉書房、1978年、第208頁。

⑧ 第1軍参謀部『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1938年4月12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9300。

⑨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第2軍の作戦に関する諸事情』、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8700。

⑩ 『畑俊六日誌』、130頁。

⑪ 『戦史叢書・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朝雲新聞社、1976年、第9、42頁。

⑫ 第1軍参謀部『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1938年2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5300。

攻作为八路军发展重点的五台山一带，要求不仅“彻底消灭”共产党员与八路军，还要“彻底消灭”与之有关系的民众^①。4月上旬，日军第108师团率先对晋东南的八路军第129师发起九路围攻。而作战开始后，第2军联络第1军，承认“台儿庄附近的战斗显然已经失败，第2军正努力挽回战局”，请求其紧急自山西向津浦线调兵援救^②。华北方面军不断向第1军发出紧急调兵命令，第1军只能抽调用于“扫荡”的兵力，“中止对五台中共军队的扫荡，就可以让第109师团的兵力有余裕”。第1军后来总结教训称，徐州会战期间，“考虑现有兵力，为了实施本次作战，只能放弃潞安盆地，且不得不放松太原北部的戒备”，当然也“中止对五台山的扫荡”^③。香月清司也表示，为“策应徐州会战，此次占领区的肃清作战即告终止”，“空留‘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之恨”，于是“士气逐渐松懈，战意消沉”^④。

随着日军主力调离山西，抗日武装迎来大的发展时期，如沁县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期间，相继组建人民武装自卫大队、牺盟游击队、公安游击队及农民抗日救国会等^⑤。第129师也趁“华北日军正抽调兵力会攻徐州，第一〇八师团已奉命转调豫北，日军其他部队也在调整部署，我军乘机出击”^⑥，发起反攻。

1938年春，日、国、共三方战略均出现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寻求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攻势，趁日军攻势显现疲态，集中兵力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促成了台儿庄大捷。日军希望能以决战尽快结束战争，利用国民党军队集结主力的机会，从速发起围歼战。中共趁日军发动徐州会战而后方空虚，在华北战略展开，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作为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

三、徐州会战与八路军挺进平原作战

徐州会战开始时，中国抗战格局尚未出现根本变化。日军仍然掌握战场主动权；国民党军寻求攻势防御，却缺乏在决战中与日军对抗的能力；八路军主力仍然局限于山西一省山地地区，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力。但日军匆忙进攻徐州，打破其战略的延续性，使其“消极持久战思想破产”，“被眼前的形势牵着走”^⑦，在迅速向徐州推进的同时，后方占领区的形势陷入混乱。

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地增兵在徐州决战。4月，第20集团军等前线部队已注意到“敌在鲁南大举增兵”，“总兵力达十数万人”，“战局之发展，实令人忧虑”^⑧。李宗仁报告“至平汉山西之敌亦在纷纷东向转移于津浦线上。似此各方之敌，集中于津浦方向，似欲在鲁南一带与我决战。”^⑨ 蒋介石原本顾虑“勿使我军丧失战斗力，以求持久”，但又押注于日军增兵能力有限，“敌在津浦南北两段，总兵力不过八师，而其三师已被我击破”^⑩，考虑到日军进攻前势必分兵守备，中国军队似可占优势，遂电令“鲁南方面敌之攻势已顿挫，决全线转攻势，加敌以更大之打击”^⑪。李宗仁随之以“贯彻与敌决战方针，移动兵力，准备一切”的思路进行部署^⑫。5月

① 第1军参谋部『第1军机密作战日誌』、1938年3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7500。

② 第1军参谋部『第1军机密作战日誌』、1938年4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69300。

③ 第1军参谋部『第1军作战经过概要·徐州会战』、1941年7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83300。

④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第85册，第108页。

⑤ 《中国共产党沁县组织史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第44页。

⑦ 堀場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第162、163頁。

⑧ 马千里《峥嵘岁月——马千里抗战日记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⑨ 《李宗仁报告津浦沿线敌情及作战方针密电》（1938年4月20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第553页。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4月24日、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⑪ 《蒋介石关于鲁南等地作战部署密电稿》（1938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第560页。

⑫ 《李宗仁等报告鲁南会战方针及兵力部署密电》（1938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第561页。

日军兵力调整接近完成，在徐州附近部署华北、华中 8 个师团、2 个支队，以及关东军 2 个旅团等，多达 20 余万人。而当时蒋介石仍认为日军兵力不足，“既不能由其国内新增援兵，则我可积极增兵进击”^①，仅考虑正面作战占得优势，未能发觉日军围歼企图，“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到第一线”，“第一线正面绵亘三百多里，投入兵力四十多万”，而机动部队不足^②。

5 月，日军向徐州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迅速崩溃，但日军亦未完全达成战略目标。5 月 5 日，日军各部按既定部署，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迂回包围。15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济南开设战斗司令所，督促各部按计划迅速推进。由于发现中国军队突围的企图，日军 17 日发布作战命令，宣布“徐州附近敌军主力濒于全面崩溃”，要对之“压倒击灭”“穷追捕捉”^③，各部迅速收缩包围圈。同一天，李宗仁托词“各方面部署已大体就绪，为指挥便利计，拟于今晚移动指挥位置”^④，紧急撤出徐州。蒋介石仍坚持“只要我运河与徐州国防工事能固守不动，则敌此次大包围之计划，必可被我粉碎，而且可予以歼灭也”^⑤，要求李宗仁“突围后如能反攻徐州更好”^⑥。但他很快发现，日军进攻之凶猛远超预计，向来“敌人未有如此之速，而敢冒险也，实使人猝不及”^⑦。为阻止日军快速追击，国民党竟于 6 月 9 日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日军拦截围歼国民党军队的目标也未能实现，由于其进攻徐州的决策极为仓促，准备很不充分，在作战中甚至出现由于缺乏情报，将迎面遇到的国民党军队误认为友军的情况，最终使国民党军队主力得以逃脱^⑧。

日军在徐州构建包围圈所付出的代价，是华北后方占领区的形势濒临崩溃。5 月，日军主力猛扑徐州，后方防备极端空虚。以晋南的第 20 师团守备区为例，“山区的敌军进入平原，中央军大兵团也渡黄河北上，各地守备队被包围，同时民众活跃地进行抗日游击战”^⑨。第 20 师团向第 1 军求援，强调在山西西南部无力防守。收到报告后，第 1 军认为，这是“受到方面军主要作战（即徐州会战）的不利影响”^⑩，“本军可使用之余力殆尽”，于是“对增援的要求予以回绝”^⑪。第 20 师团司令部被团团包围，连辎重队都上了一线^⑫。为解救困局，第 1 军批准第 20 师团“使用特种发烟筒及特种发烟弹”，即毒气，要求“特别注意掩盖使用特种烟弹的事实，切不可留下痕迹”。第 109 师团各据点也被包围，中阳守备队陷入重围无法突围，“粮秣已尽，请求向城内空投”。^⑬ 山西境内日军全面陷入寻求自保的困境。

山西日军的困境，意味着八路军形势的迅速好转。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杨尚昆报告“在省委所辖之二十四县内，现只同蒲沿线各县、汾阳、离石、中阳、孝义、河津、稷山等城有敌据守，整个吕梁山脉中的十余县，已全无敌踪。据守各城之敌，多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多系据守城内，不敢远出”，“敌以增援津浦之故，月前曾大批抽调在山西的部队去徐州附近作战，故山西能取得这样的暂时缓和，敌人不得不暂取守势。这是山西南部的情况，也可以说是我们开展工作最有利的、最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 年 5 月 8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② 刘斐《徐州会战概述》，《徐州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第 30 页。

③ 陸軍大学校『北支那作戰史要——北支那方面軍 9 月 1 日以降作戰經過の概要』（9）、1941 年 7 月 10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27700。

④ 《李宗仁电蒋中正》（1938 年 5 月 17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20300-00010-046。

⑤ 《蒋中正电李宗仁》（1938 年 5 月 17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20300-00010-043。

⑥ 《蒋中正电李宗仁》（1938 年 5 月 21 日），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 002-020300-00010-051。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 年 5 月 24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⑧ 兵東政夫『歩兵第十八聯隊史』、1964 年、311 頁。

⑨ 『歩兵第七十八聯隊史』、東京歩兵第七十八聯隊会、1983 年、73 頁。

⑩ 第 1 軍參謀部『第 1 軍機密作戰日誌』、1938 年 5 月 27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71400。

⑪ 《中日战争回忆录摘记——香月清司手记》，《近代史资料》第 85 册，第 110 页。

⑫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166 頁。

⑬ 第 1 軍參謀部『第 1 軍機密作戰日誌』、1938 年 5 月 27 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71400。

应该抓紧的时机!”^① 在山西南部,晋冀豫根据地面对的日军第14、第16师团均调往徐州参加会战^②;在山西北部,晋察冀根据地的情况如聂荣臻所言,在徐州战事紧张中,日军是无力来肃清华北的,相反的,它还要转移华北的兵力以增援徐州方面^③。在黄河河防方面,八路军也以反攻迫使军渡、碛口之敌东返离石,并驱逐了侵占府谷之敌^④。

针对华北战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而灵活地转变战争策略,及时作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大决策。在战争实践中,中共逐渐尝试向山西之外探索平原游击战的可能性。刘少奇提出要在华北山地与广大农村普遍发展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只要有群众,就能发展游击战争”,突破了地形对游击战争的限制。晋察冀边区首先明确提出平原游击战争。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军队,与晋察冀根据地取得联系,在冀中开辟中共首创的平原抗日根据地。第129师也发现整个冀南平原“日军无几”,国民党统治崩溃,日伪统治尚未完全建立,广大农村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于是派先遣队伍深入冀南平原开展工作,很快立稳脚跟^⑤。这些探索表明,日军集中兵力于正面前线,后方未及完成部署,使平原游击战成为可能。1938年3月11日,刘少奇与杨尚昆等提出“太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地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支持。4月,日军向徐州方向集中的同时,中共中央判断华北形势已大为好转,向平原挺进的时机成熟。20日,毛泽东、张闻天与刘少奇共同致电聂荣臻、彭真、朱德、彭德怀等,指出“目前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巩固已获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⑥。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提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普遍发展游击战争”^⑦。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八路军挺进平原实现了根据地的大发展。在冀中、冀东地区,八路军4月粉碎日军“扫荡”后,成立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八路军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成功领导冀东人民武装大起义。^⑧在冀南、冀西地区,4月2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从太行山区迅速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⑨。第129师前梯队由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前出到邢台以西,将主力分为平汉路东西两个纵队,分别向冀南、冀西进军^⑩。5月初,第129师主力到达冀南,加速了当地先遣组织各项工作的进展,到9月已解放冀南20余县,收编大量游杂武装,开辟拥有800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⑪。在山东,由于当地“已完全沦为敌人后方”,日军深入向南,“对山东腹地广大山区和平原尚未进行大的‘扫荡’。这种形势为我党领导山东人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萧华纵队和685团于9月先后进入冀鲁边和湖西地区^⑫。而在山西

① 《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193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101页。

②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第46页。

③ 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1938年4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④ 曹里怀《守卫千里河防》,《八路军·回忆史料》(3),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⑤ 张国星《平原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制定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⑥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第206、212、213页。

⑦ 《毛泽东等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8年4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6页。

⑧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113页。

⑨ 岳思平《八路军战史》,第112页。

⑩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第46页。

⑪ 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陈再道《东进冀南》,《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89、112页。

⑫ 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139页。

留守的八路军，同样“利用战机大举袭敌，猛烈扩大根据地”^①。在日军集中力量于正面战场的4月至10月，八路军先后创建和扩大冀南、豫北、冀鲁边、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根据地得以巩固，还向山东和大青山派兵发展^②。

八路军向平原的大胆挺进，基于中共中央对日军战略的准确判断。八路军总部曾担忧，徐州会战后日军“迅速转移主力来华北首先进攻我军”的可能^③。但结合徐州会战后的实际形势，中共中央于5月26日指示八路军“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④；6月2日指示新四军，“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⑤；15日强调，“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⑥。

八路军自山地游击战向平原游击战发展，使游击战争的基础得到了巩固。随着进军平原，“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和冀东就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这种相互依靠，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更有力地钳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下去”^⑦。

八路军在占领区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军政高层押注于对国民党政府打开媾和窗口，从而自战争中脱身。由于国民党政府未如日本所预期的崩溃或衰落，日本动摇了与之作战到底的方针。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决策层的基本思路，是改变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在军事上加大施压，在政治上降低调门，诱使国民党政府求和。5月底，首相近卫文麿进行“内阁改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要推动者——陆相杉山元、外相广田弘毅被迫辞职，分别由板垣征四郎、宇垣一成接任^⑧。天皇密友、文部大臣木户幸一表示“徐州会战后，一方面有必要显示继续进攻汉口的态势，一方面要考虑结束事变的方法。”^⑨而板垣与宇垣的上任，就是要利用他们精通中国事务与国民党政府媾和以结束战争^⑩。宇垣要借“徐州的胜利”调整原有方针，“寻求光荣的和平”^⑪。6月24日，近卫内阁通过《今后之中国事变指导方针》，要求“对第三国友好的调停，根据其具体条件，可酌情同意”^⑫。

日本高层的政治意图裹挟了参谋本部的作战方针。参谋本部支持媾和以避免持久战，“与陆军省就希望尽早解决中国事变达成了一致”，准备发动使国民党政府崩溃或求和的大决战。这意味着巨大的作战规模，“陆军需要在既有预算之外，增加八亿二千五百万日元的经费，停止在华兵力减半的计划，增加约四十万兵力，新设二十四万兵力”^⑬。有作战参谋提出，要进攻武汉，除一般的作战准备外，还要考虑建设新军、对苏备战、国内整顿等重大问题，无计划地扩大战线是非常危险的^⑭。但参谋本部着眼于政治要求，采取冒进战略，押注于“政治军事手段相配合”，以“确定日

① 王震《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163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496—505页。

③ 《朱德彭德怀关于配合津浦线北段作战的指示》（1938年3月9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第100页。

④ 《在华北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7页。

⑤ 《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938年6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51页。

⑥ 《在华北西北放手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55页。

⑦ 聂荣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115页。

⑧ 秦郁彦『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太平洋戦争への道』、朝日新聞社、1963年、47頁。

⑨ 『木戸幸一日記』（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645頁。

⑩ 極東國際軍事裁判研究会編『木戸日記・木戸被告人宣誓供述書全文』、平和書房、1947年、47頁。

⑪ 『宇垣一成日記』（2）、みすず書房、1988年、1239頁。

⑫ 『今後の支那事变指導方針』、1938年6月24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0538600。

⑬ 『戦史叢書・大本营陸軍部』（1）、546、548頁。

⑭ 堀場一雄『支那事变戦争指導史』、164頁。

华关系调整的根本方针”与进攻武汉相结合来“解决事变”^①。

参谋本部的战略规划忽视了敌后战场的影响。日军对攻占武汉的影响寄予厚望。陆军认为“攻占汉口、广东相当于控制了中国，这一作战可以通过武力基本解决中国事变”；海军也认为，从历史来看，“控制中原即实际控制中国”^②。对日军而言，八路军实施的游击战争确实“颇为新鲜”，天皇裕仁曾询问持久战期间日军“如何对抗游击战术”，参谋本部承认“尚未详细研究”^③。

日军的战争规划主要基于对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的考量。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重要区别，在于“进”“退”界限的模糊。对正规战争而言，敌“进”则我“退”，日军进攻范围愈广大，则国民党控制区愈狭小。对此蒋介石自我安慰地强调“地区愈小，成功愈易”，“此次抗战必将缩至最小区域”^④。日军考虑到战线拉长、分散兵力的危险，但认为即便陷入持久消耗战，在日占区与国统区对峙的战争格局下，日占区范围愈大，战争形势便愈加有利。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就曾分析称“考虑到地域、人口、资源等关系，要在当地自给自足，占领区便不能失于狭小，否则将导致日本的战力消磨渐减。我军必须要将蒋政权从中原驱逐至边陲之地，从而占据军事、政治、谋略的有利态势”^⑤。

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成为塑造战争格局的“第三者”，根本打破日军的战争预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日军战略并指出，对日本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是，“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⑥。抗战力量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它的前线，使敌人在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⑦。换言之，日军得到的不是其预期的汲取长期对峙所需资源的稳定后方，而是漫长的数千公里新战线。

徐州会战至武汉会战期间，中共在华北敌后实现根据地的大发展，积聚着塑造战争格局的新力量。周恩来曾于1937年10月与北方局讨论将华北分为9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直南、直中、冀东、山东。1938年4月中共发出进军平原的指示后，至武汉会战结束时八路军在上述大部分地区已经站稳脚跟。1939年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进山东地区，标志着华北游击战场布局的完成^⑧。日军总结教训也认为，“我军主力为攻占徐州而南下”成为八路军发展的机遇，“新四军、冀中军区、冀南军区、冀察热宁边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山东纵队等几乎都是这一年成立的”，武汉会战后“各部队、各根据地乃至游击区都已经形成，成为中共军队发展的基础”^⑨。至1938年10月，八路军由1937年8月成立时的4万6千人发展到了15万余人。^⑩虽然与关内近百万侵华日军以及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对比，中共的军事力量仍处于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但凭借游击战争的高机动性，使作为日军核心占领区的华北普遍成了战区。

中共参与塑造战争格局的方式，并不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以建立根据地社会秩序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日军称对中共“最需要注意的是其政治工作”，中共的组织、动员、宣传能力极为突出，甚至“连归顺皇军的剿共军都被分化”^⑪。日军后来根据战争实践，分析中共政治与军事工作

① 参謀本部第二課『戦争終結二開スル最高指導案』、1938年8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056500。

②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546頁。

③ 参謀本部第二課『機密作戦日誌』、1938年1月1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391600。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⑤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538頁。

⑥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

⑦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⑧ 于化民《中共领导层对华北游击战场的战略运筹与布局》，《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⑨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中国共産党運動の解説』、1941年2月1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490000。

⑩ 岳思平《八路军战史》，第220页。

⑪ 大本営陸軍部『対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共産軍の活動』、1938年10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0434500。

的关系，认为“所谓统一战线，绝对不是单纯和国民党合作，而是首先要广泛组织民众”，中共“在社会各方面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全体民众，其构成虽然复杂多元，但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并从其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得以扩大强化，得到强化的党再不断重复上述过程。民众被组织起来后，中共一边对其武装化，一边让其参加政治组成行政机构，这样就在党的周围形成军事、政治机构，再以之迅速推进上述再生产过程”，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政策，“都加深了对民众的影响”，同时“使游击战的展开成为可能”^①。基于上述认识，日军恼怒地将中共称为“治安之癌”。由于中共军政体系的存在，伪政权无法建立独立的统治秩序，只能完全依靠日军军事力量。日军处处布兵，将占领区内部也变成战争前线，而这一战线的长度几乎是无限的。

日军在徐州会战后迅速发现了问题，随即在华北展开“扫荡”，但已无法威胁八路军的生存。武汉会战期间，华北方面军留驻主力于华北，指出中共在太行山的活动“正波及华北全境”，“恢复治安的地区只有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的范围”^②，准备集中力量发动“扫荡”。九十月间，华北方面军发动“山西北部肃正作战”。为此，中共中央判断“华北游击战的普遍发展，全国抗战配合，目前敌仍不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周密的围攻计划。”^③结果日军意识到“中共势力暗中已显著扩张”，在局部地区的“扫荡”无法对八路军的生存造成根本威胁，但“要在华北全域开展大扫荡，兵力又远远不足”^④。频繁“扫荡”后，日军于1939年初发现，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受到巨大打击”，晋绥军也“发生巨大动摇”，只有八路军反而扩充了部队，“交通线的匪害比十二月加倍了”，感慨“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相当有韧性，要彻底讨伐并掌握民心，未来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⑤。这意味着八路军华北的战略展开趋于完成，在主力牵制于武汉方向的情况下，单凭华北日军已难以威胁八路军的生存。这与年初的战局完全不同，也证明了中共战略决策和展开的及时有效。

1938年末，日军总结本年度的战略失误，并分析中共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参谋本部称“徒劳的持续进攻内地，只会中了敌军的消耗战略之计，有害无益。而抽出大量兵力作战，使我占领区内部治安迅速恶化，尤其是中共军队迅速而强力地进行渗透，因此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当务之急。”^⑥他们还承认“汉口陷落后，事变将进入新的阶段，届时我军最大的任务是尽快恢复中国的治安。治安不恢复，不管我军想干什么，都无法腾出手来，中国治安之癌便是赤色势力，要斩草除根地消灭中共军队。”^⑦

日军总结教训准备战争“新阶段”的同时，中共也总结了成功经验，准备迎接抗战“新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论新阶段》，认为到日军“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新阶段”，“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⑧。从国内战争转为民族战争，从正规军和运动战转为游击军和游击战，中共“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⑨面对1938年战争形势的转变，中共中央对日军战略的准确判断和大胆决策，成为打开游击战争局面的关键因素。

①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勢力は如何にして滲透發展するか』、1941年2月1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490400。

②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状況報告提出の件』、1938年9月2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3370900。

③ 《关于战胜敌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的指示》（193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45页。

④ 『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68頁。

⑤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占拠地域内治安状況』、1939年2月2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672000。

⑥ 一復資料課『昭和13年末対支情勢判断』、1946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155500。

⑦ 大本営陸軍部『対支作戰参考資料（教）結言』、1938年10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0435500。

⑧ 《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85页。

⑨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6页。

对比日军在1938年初至年末战略的变化，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中共的发展及其在塑造战争格局中的作用。年初日军设定的应对持久消耗战的规划，核心是从占领区汲取战争资源，减少日本自身的战争投入。而这一年日军战争规划的变化，也始终以日占区与国统区的对峙为前提，日军的战略优势和日占区的扩大，似可保证日本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但中共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平原游击战，在敌后广大地区实现了战略展开。在日军设想的双边战争格局中，出现了中共这一特殊的独立自主的“第三方”，使日占区普遍成为新的独立战场。中国抗战拥有相对稳定的大后方，可以集中兵力于正面前线，日军却不得不面对后方也是战场的困境，这极大地弥补了中国与日本国力差距所带来的影响。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支援配合，牵制消耗日本大量兵力，抗日战争逐渐步入战略相持阶段^①。

四、结 语

1938年，日、国、共三方战略与抗战格局出现了大转变。毛泽东指出，中共实现应对民族战争与游击战争的转变，意义非同寻常，“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②。而中共的成功，与中央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并应对日军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

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博弈，深刻影响了敌后战场的发展形势。1938年初，日军计划在实现第一阶段进攻目标后，采取战略紧缩，切实控制占领区以应对持久战。中共在华北开始战略展开的时间不长，根据地尚不稳固，存在八路军主力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而日军战略紧缩引起的保守姿态，使国民党认为日军进攻出现疲态，试图从消极防御转向攻势防御。台儿庄大捷加速了日军战略的调整，为围歼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并进而突进武汉，日军仓促从占领区调兵，使其后方出现空虚。中共中央基于对日军暂时无暇顾及后方的判断，果断作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重大决策，抓住机遇以主力前出平原开辟大片敌后根据地，为游击战争创造了回旋余地。

中共对战争格局的重构，并非完全依赖仍然较弱的军事实力，而在于其以卓越的政治能力，在敌后战场以根据地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日军即便以“扫荡”确认其军事上的优势，亦无法普遍建立统治秩序。这使其欲“进”正面进攻完成战争，受限于大量兵力被牵制于占领区；欲“退”应对持久消耗战，受限于敌后战场而无法战略收缩节减消耗。日军向前线集结兵力取得战役胜利，不仅不能完全赢得战略优势，相反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日军也反思战争教训，模仿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中共在1938年战争格局激变之际，根据敌情所作出的大胆战略抉择，使其领导的游击战争得以立稳脚跟并扩展至平原地区，成为决定中共命运与抗战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正是以此为背景提出《论持久战》，基于战争经验作出最后胜利的论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③。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乔 君）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第525、526页。

②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26页。

③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